

# 中国制造的新挑战和新红利

邵宇

加入WTO之后,经过多年成长,中国已经演变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但是,老一代贸易协定带给中国的红利已基本释放完毕,一方面国内经济越来越容易受海外供需的冲击,另一方面,WTO的多哈回合已经陷入僵局,WTO代表的多边贸易协定对中国的红利已经逐步消散。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推进较慢,那么未来中国制造将面临什么样的新挑战?我们认为,未来国际贸易的竞争将沿着价值链进行,而合作则主要以区域和双边形式展开;对应地,中国面临的将是内部产业升级的压力与外部自贸合作圈地的复杂博弈。

## 未来全球贸易竞争将沿着价值链展开

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通过加强全国动员的总成本领先战略,成为主要的受益方,不仅一度是全球贸易失衡中最主要的顺差方,也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资产。G2失衡标志着全球化3.0的外部失衡循环难以调和,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虽然有所缓解,但全球失衡情况整体改善不明显,只不过失衡矛盾的核心从中美分散到了更多的消费国与生产国、资源国。

危机前2000~2007年经常账户率提升的盈余方,在危机后2007~2013年经常账户率都有回落;对于赤字方也是类似:这是基于危机后以邻为壑贸易保护政策下的系统自我调整,也受到实际汇率变动的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趋势都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其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导向与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独立使得其需求“内卷化”,这是全球贸易恢复乏力的主要原因。

由于私人部门杠杆去化比较高,美国经济已经进入确定性比较高的恢复通道,但对其他经济体的拉动却已远不如前。而日本在安倍经济学的影响下,进入了以抬升通胀,刺激消费为特点的货币大扩张中。

比较有意思的是欧元区的分化,其边缘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一直在治标,却难以治本;特别是希腊的主权债务问题更成为了周期性爆发的风险点。这种杠杆率的差别以及经常账户率(赤字/盈余)差别的导致的分化,使得欧元区核心国与边缘国在危机后严重分化。为了维持欧元区的稳定,主要的边缘国家进入了痛苦的财政整顿进程中,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外部逆差缩小;这使得欧元区从过去德国苦力支撑下的逆差经济体逐渐成为典型的顺差经济体。总之,随着各主要经济体的主动和被动调整,